

史论

鲁迅的镜像

——通过回忆鲁迅的文章谈鲁迅形象的变迁

张大海

拉康认为：“镜中形象显然是可见世界的门槛，如果我们相信从自身躯体的意象在幻觉和在梦境中表现的镜面形态的话，不管这是关系到自己的特征甚至缺陷或者客观反映也好，还是假如我们注意到镜子在替身再现中的作用的话也好。而在这样的重现中异质的心理现实就呈现了出来。”⁽¹⁾

从拉康的心理学镜像可以得到启示的，就是我们在对历史的探寻中所不得不同样需要面对的历史的语言镜像，以及在产生和传播这种历史的语言镜像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质问可能的历史维度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同样不应忽略的是在进行历史事实的探寻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需要得到求证的事实和同样需要得到证伪的发现。但在抛开了这些作为历史考证目的的史实回归后尤其值得警惕的，就是作为演示历史的语言，因为先天具备的对历史进行当代想象的权力，而产生的对语言积累下来的历史如何认识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的鲁迅接受史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由于语言而来的潜在问题，具体到阅读回忆鲁迅的文章，是否应该按照文章本身的叙述认定话语中的鲁迅就是一件值得甄别的事情。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的重要文化现象，已经因为后人设定的种种镜像的变迁，成为展示中国人在20世纪思想变迁的一面镜子。事实上，回忆者对鲁迅不同镜像的解读，映照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爬行中的种种艰辛和困顿。当然，这些镜像的存在不独是他活着时的文字使然，也同样是死后的喧嚣使然。

因为需要通过在不同话语中，对不同的鲁迅镜像的叙述意义进行引导，才能发现鲁迅这一被言说的镜像本体在语言中的内涵身份，那么我们就只能以各时代回忆材料的产生本身为出发点，发掘属于不同时代的鲁迅镜像的隐性阐释。虽然这意味着阐释会涉及到周建人《回忆鲁迅》这样由众人代笔完成的文章，但作为一种已然出现过的事实本身，它在研究中的意义还是不能回避的。不幸的是，那个真实存活过的鲁迅在今日是不可触摸到的，我们只能在经历一种想象的回忆中与他擦肩而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只能看到镜像化鲁迅的原因。

一、1936年前后的鲁迅镜像

鲁迅是在1936年10月19日凌晨五时许逝世的，但对鲁迅的回忆文章却早在鲁迅逝世的十多年前即已经出现了。现在见到较早的是曙天女士的《访鲁迅先生》、《日记片断》，马珏的《初次见鲁迅先生》等。这个时期亲近鲁迅的追忆，往往集中于把鲁迅作为一位知名作家的日常接触中的点滴感受，同时又注意在提供完备言辞的前提下记下有声色的鲁迅在朋友间的变化。曙天女士的《日记片断》：

他虽然是个老人，然而顽皮得可以呢。⁽²⁾

当时十六岁的少女马珏《初次见鲁迅先生》的片段：

我心里不住地想，总不以他是鲁迅，因为脑筋已经存了鲁迅是一个小孩似的老头儿，现在看了他竟是一个老头似的老头儿，所以不很相信。⁽³⁾

从这些回忆录对鲁迅的预设式定位来看,鲁迅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但这种知名度更多的是作为知名作家的知名度。虽然鲁迅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已经有强烈的公共知识分子倾向,但相比于后期他在上海作为战士形象的鲁迅相比,鲁迅在友人的回忆中还处在作为自己,由外表和语言来显现个性的时期。而且,更重要的是鲁迅在此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成就,成为社会范围内参与文化制造机制的符号化产品,与鲁迅的接触也并不能成为为观赏者提炼生活意义的突破点。这样,20年代前期的回忆文章在数量上的稀少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也许作为奋斗期的鲁迅,这个时期还需要他进行默默的等待,通过拼搏时空的重负来实现确认自己独特的意义。

鲁迅的逝世无疑是回忆鲁迅文章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刻开始,回忆鲁迅的文章开始大量出现,而且其间掺杂的细节也开始出现差异,对鲁迅的称赞与摧毁都表现在其中了。但可以肯定地是,对鲁迅进行战士的阐释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这一时期最好的作品。这篇文章与其他人的不同首先即在其文本的差异上,当然她的优势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萧红是写心的高手,她能用语言将自己所经历的世界描绘的细致入微,将生活渐次展开成为心灵的画卷。这种叙述方式在今天看固然是美的,但在30年代的中国,却断不能成为革命所期待的号角的。这在当时的缺憾,在如今看来反倒因为萧红与政治的距离,而保留下来接近无需争吵的历史画面的平静叙述者的权利。她的这篇文章作为她灵动和温婉的性格集合,无心的点破了那一时代的暴力与悲痛,使得对鲁迅的回忆能够独立的进入结束革命张力后的平和阅读中。这样一部长篇散文,萧红没有将对鲁迅的回忆分割成不同的散文题目来做,而是将对鲁迅的长短回忆集合起来,画出一个整体的轮廓来。这当然有萧红作为女人的优势,但相比那些只与鲁迅有过短暂交往的人来说,又是与鲁迅后期生活密切交往的经历分不开的,这也使得萧红的鲁迅同时兼备家族成员和师长的味道:

海婴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⁴⁾

这种如数家珍的娓娓道来的回忆,自然要比单调的亢奋式颂扬形象好许多。而且,对鲁迅先生“乡下的安静老人”的形象定位,也同时存在着对相同时期内文学意义的反驳。应该指出的是,在战争话语与革命思维占据统治地位时,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直至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文学的定位,长期以来是将之归入思想问题的,而不是将之归入艺术问题来考虑的。文学作为艺术的意识一直被冻结在意识形态的冰窟中,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文学对于感性世界的失落与理性命题的过分承担,左翼文学失去趣味,令人难以卒读的原因即在于此。萧红作为一个有着人道主义倾向的作家,能够避开左翼的模式化写作,直接用自己的感受写出鲜活的鲁迅形象,确是她的立场带来的功绩。

许广平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以个人的感情痛哭为主,她作为鲁迅的爱人,一个年幼孩子的母亲,规避开宏大叙事式的革命热情,进入被抛弃的《我怕》,更能表达出对至深爱人的感情。同时,为支持鲁老太太和朱安的生活,《鲁迅全集》的出版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无助的许广平在正视生活的痛苦中所不得不忍耐的时代考验,也成了她在这一时期回忆鲁迅的主题。

就大的范围来说,三四十年代的大环境使得上述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在国家、民族的危亡面前并不受革命者推崇。在中国共产党富有指导性的文化革命的宣言中,在毛泽东的《鲁迅论》给鲁迅的定位和《新民主主义论》称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些极富鼓动性的判断中即可以看出来,革命是需要带棱角的坚硬文化裹挟在历史中前进的,这是革命的目的对战斗者的渴望。鲁迅作为以公共知识分子精神为立足点的重要作家,深受广大左翼青年的爱戴,自然也会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而融入持久的革命符号系统中。鲁迅逝世后,作为仍可创造出来的,面临国家民族危机的镜像的鲁迅,当然就不再是作为个人存在的鲁迅,而是要作为革命系统中的鲁迅。这种因政治力量的观照而产生的对鲁迅先生的回忆,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起到聚集革命者继续不断的、自觉的参与到革命斗争需要的目的。这种归于极致的鲁迅,也是容易因为对鲁迅某面真理的过分强调而歪曲一些作为更全面讨论的鲁迅镜像的可能的。作为预言式的回应,就是一旦当这样的历史情境过去,回归后的鲁迅镜像,就不得不面临对曾经

的镜像进行如何阐释的问题。

许寿裳作为鲁迅多年的朋友,能够以不同于青年学生的平静而又不失尊重的谈论鲁迅是他对鲁迅的一份很好的纪念:

鲁迅出学校以后,从事战斗的新文艺工作,亘三十年。这三十年间始终维持着最朴素的学生和战士的生活;“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节衣缩食以购图书,以助穷苦青年的学费。⁽⁵⁾

这样对鲁迅的纪念,使读者从鲁迅的日常生活状态上来理解鲁迅,自然而然地在鲁迅的朴素中体会到面对鲁迅的感动。比较以后若干年的文章,许寿裳这种平实的语言在当时显的尤为珍贵。

虽然有以上的背景差异,这十多年来对鲁迅的回忆仍然构成了以后回忆的主要传统,即一个是公共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的鲁迅,一个是以家庭成员、朋友、师长面目出现的鲁迅。这些文章的缘由也便是来自于公共精神的需求和鲁迅身边人在同样为制造再生的鲁迅的双重作用,这可以从对“鲁迅没有死”这样的现实命题中得到很好的验证。事实上,这种“不死”宣传本身即是在意味着鲁迅的不可替代性,他逝世后的巨大空白是难以填补的,所以他的镜像只能成为存活下来的革命者,继续发挥着为公众的公共目的。当然还要强调的,就鲁迅本人来讲,实现弃医从文的理想本身既已包含了一个为实现公共知识分子话语理想的目的的,这在社会规则失序和国家危亡的背景下,也正是他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价值理想的最佳体现。在他的文字实践和为社会变革所发挥的力量来看,推动话语公共职能的实施一直都是他文学创作和社会批评中最基本的话语前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共鲁迅的基本身份原则。而在这方面立足回忆鲁迅,也变顺理成章的成为这一时期重要回忆资料的生长点。

阿累《一面》: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⁶⁾

这样战士的姿态使鲁迅成为一个时代的青年楷模,也同时会成为某些人攻击的靶子。

美子《作家素描——鲁迅》: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

讲演时,常喜把手放在长衫的后大襟里,在台上像动物园里的老熊一样的踱来踱去。⁽⁷⁾

对鲁迅攻击性的回忆当然并不是回忆文章的主流,但这种文章存在下来的意义却是明显的。因为有他们的存在,鲁迅作为战士的战斗才会有放的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外国友人也相继写出了一些回忆鲁迅的文章,为丰富鲁迅镜像的素材提供了新的视角。比如日本友人鹿地亘1936年5月4日发表在《世界日报》的《鲁迅访问记》:

他的眼睛,是怎样充溢着静穆而温挚的情味的眼啊!他的眼就像在底里荡漾着光辉的深泉那样澄澈着。当房门推开,穿着宽大的华服的他,静静地走进房里来的那一瞬间,我立刻就感到了这一点。我和他对坐着,为他那静穆的神情所震撼,就像怕在泉中激起波纹似的沉默着。⁽⁸⁾

鹿地亘眼中的鲁迅,仍是作为智者的鲁迅,这也提醒了人们确实存在过的一位曾经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的鲁迅。这种视角的鲁迅是鹿地亘在不同于中国人的政治阐释中推理出来的鲁迅镜像,可以归入私人系统中的镜像系统。但鹿地亘的鲁迅又不同于许广平作为亲人的鲁迅,鹿地亘没有滞于感情上的崇拜,而是对鲁迅外化在身体上的神情进行独特智者的把握,使鲁迅因为这一文字的记述成为那个时期某种理智的化身。

二、1949-1976年间的鲁迅镜像

这一时期产生的鲁迅镜像,不能不提到政治话语对鲁迅阐释中的决定性作用。首先,政治褒扬成为鲁迅回忆的指导性原则。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反驳鲁迅已不可能了。其次,对于革命成功前的文化改造也一直是确保革命政权合法化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作为曾经强烈批判过黑暗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对革命政权在黑暗时代的政治走向中的道义合理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推断,仍然可以起到符合革命政权需要强调的发挥现政权的的历史优越性的作用的。更何况,为实现除政治和军事的合法存在外的文化存在,在新解放区推行鲁迅的某些价值是能够起到吸引民众,以达到思想共识这样一个更加紧迫的任务的。而且,区别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文化,1949年后人民政府对有着类似革命殉道者

经历的鲁迅,也极愿使符号化了的鲁迅成为需要的符号工具。那么鲁迅对人民政府的敌人展开的批判,也就在无形中等同于对人民政府在同样领域内的肯定。此时对鲁迅积极的话语阐释,也就成为这一时期革命阐释顺理成章的延续性原料了。

许广平在建国后写了三本回忆鲁迅的书,分别是1951年的《欣慰的纪念》、1954年的《关于鲁迅的生活》和1960年的《鲁迅回忆录》。这个时候的鲁迅在许广平的笔下是强调鲁迅作为人民一分子的形象的,比如许广平1950年5月4日致李铁根的信:

他的面色类似一般劳动人民的黄黑色并稍带些不健康的灰色,因为时常夜间写作,少见阳光,更似工厂中的厂工。面型略方,须发粗硬,有笔直而较大的(较一般中国人)鼻子。眼在五官中似略小,但有精彩而慈祥,可以弥补其小且调和其须发与鼻子的刚直之气。⁽⁹⁾

许广平的这一段描写,强调了鲁迅的“类似一般劳动人民”的慈祥、刚直的相貌特征。这些是符合鲁迅为公众的一面的。但也不应忽视的,在建国初期以出身划分阶级甚至敌我的年代里,“人民”这个词本身既已包含了对处于不同话语场内叙述对象进行区别对待的可能。“人民”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的形象是光荣的,但“人民”本身又成为得到共识的意识形态范畴内的命名。在同时相较曾作为革命同盟者的知识分子来说,“知识分子”这一更具批判意味的称呼已经不能成为划分鲁迅身份的用词,他在这一时期只能作为被指认的社会集体话语中的“鲁迅”才能成为可存在的鲁迅。对于这种承认的政治,查尔斯·泰勒的“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¹⁰⁾简洁的解释了这种来自多数人认识的鲁迅的来源。

相对于许广平将鲁迅立足于一个劳动人民的基点,陆万美写于1951年8月29日的《追忆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的鲁迅更是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革命成功后的鲁迅镜像与现政权的合理联系,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已经是一名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这天,先生曾忙了一整天,刚刚又做了演讲,但一点儿也不显出老年人的疲惫和衰弱,却是精神充沛,很像一个青年战士。⁽¹¹⁾

陆万美整篇文章对鲁迅的回忆过于理想化,他在这篇回忆录里甚至穿插了鲁迅在1932年到北平做讲演是假,到莫斯科参加1934年的苏联作家代表大

会是真的判断:

(鲁迅北上)主要因为接到苏联高尔基的邀请,希望他去莫斯科参加筹备着要召开的苏联作家代表大会。⁽¹²⁾

他的这一回忆后来被朱正的考证给推翻了,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回想建国初期对苏联的推崇,这里面陆万美对鲁迅想当然的回忆,更像是将其作为对中国革命史参与国际化整合运作的标志来看待的。建国初期的新中国,除了需要在国内继续巩固政权外,在国外得到各国的认可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苏联对新中国的承认鼓舞了建国初期的革命者,作为对苏联模式的信赖,对苏联成就的向往,中国的革命者在苏联的经历就容易形成寻找革命同盟的愿望。鲁迅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来,继续发挥与国际友人,尤其与苏联人的交往,对增强鲁迅革命性的塑造起到了显而易见的功效。

鲁迅在建国初期从这样的背景中被建构起来,同样也是与以鲁迅为教材进行革命教育分不开的。这时期对鲁迅的另一方面的介入既是对鲁迅一系列往事的回忆组成的。曾经经历过鲁迅青少年时代的人在这个时期已进入暮年,但因各自身份的不同,回忆出来的鲁迅镜像仍时有区别。比如作为国家干部的许广平,在阐释鲁迅的问题上就很注重鲁迅这种镜像的公共作用。许广平1961年1月14日致毛居青的信:

在年谱里,应该使鲁迅的活动与当时中外大事取得紧密联系,互相说明,不要使它们互不相干,尤其不要使它们互相矛盾,比如叙述到袁世凯称帝时期,如果不注意到鲁迅当时“每日不处忧患中”的悲愤心情,只说他如何努力来抄录古书,这对读者的教育意义就要减少。总之,“鲁迅年谱稿”的材料,应该尽量注意选用有政治意义、有教育意义、对读者有影响的材料,不能什么都罗列上去。

.....

你的这部大稿是为“七一”献礼的作品。⁽¹³⁾

此时没有了当年作上海市民困境的许广平,在回忆鲁迅的问题上已经少了无助的痛苦,开始主动进行鲁迅公共意义的挖掘。她在这一时期写的回忆录作为对鲁迅的纪念,也同时成为宣扬鲁迅精神的必要工作。

同时期区别于公共鲁迅的回忆文章是曾在鲁迅家做过多年佣人的王鹤照1960年发表的《回忆鲁迅

先生》,由于发表这篇作品时王鹤照老人已是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回忆就更像是一位历经世的历史老人在讲述久远年代的故事,同时伴随着对回到现实的提醒。而且王鹤照没有做过鲁迅的学生,所以在言辞间自然少了如许多青年在回忆中的崇敬,反倒因为作佣人的平静,使得回忆鲁迅成为只是试图进入曾经世界的一次记忆反刍。

李霁野的文章《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是典型的文化革命系统中的鲁迅形象,是很适合那个以革命的名义亢奋到极点的作品。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鲁迅的现实功用性要求的更强。开篇从毛主席的指示入手,到中间段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强调,加之建国后的政治语录,虽然就文章内容上来说仍是对鲁迅的怀念,但这种怀念却又不像是对鲁迅本人的深刻的因情感而来的依恋,倒更像是对革命生涯的神化和对现实中一套革命话语的纯熟排演。这样回忆出来的文章,并不具有理性理解鲁迅精神,或者是感性理解鲁迅性情的作用。就整篇文章来看,这只能算是政治工厂中的鲁迅。

周建人《回忆鲁迅》在文化革命中继续强调鲁迅的作用,但这部由旁人代笔的回忆更像是鲁迅论,而不是真如兄弟间情感交融式的忆鲁迅,其间夹杂着很多当时普遍宣传的政治定论,已经使鲁迅的镜像成为高悬于公众之上的抽象路线:

三十年代,鲁迅同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斗争,以及鲁迅死后,周扬之流对鲁迅的攻击,诬蔑,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王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映。⁽¹⁴⁾

这种典型的论战文章是战争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引入文化领域的记录,其使用战争词汇的用意已经发展到了极端。这样写出来的鲁迅,自是没有多大趣味。然而因为鲁迅的被利用,鲁迅的强制也就能在这样的制造中成为显见的靶子。这在九十年代后一度出现的反鲁迅文章中,得到了相应的证明。

三、1976年后的鲁迅镜像

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使鲁迅在公众视野中金刚怒目式的面目开始得到改观。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曾在年轻时访问过鲁迅的经历者,以继续鲁迅精神的情感开始了《高山仰止》的写作。作为经

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这些老人,在暮年会与鲁迅相遇,仍免不了当年的感动:

鲁迅先生对我们素描基本功的训练也极重视,把他自己珍藏的好些版画,赠送给一八艺社。正当我们苦无木刻良师指导时,传来喜讯,先生为我们组织木刻讲习班,邀请日本朋友内山喜吉先生为我们义务讲授木刻创作技法,并由先生亲自作翻译。⁽¹⁵⁾

这些事情在那些得到鲁迅关心,从事文艺创作的青年中是有典型性的。鲁迅时常帮助青年的故事从来没有间断过,鲁迅对青年的关心也同时是在帮助青年人代表的未来,虽然作为师长的鲁迅已经故去了,但这种风范却在青年们的回忆中流传了下来。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对鲁迅的回忆仍有公共话语的倾向,但作为回忆文章本身来说,立论式的回忆已经开始有所收缩,以个人立场介入历史人物的回忆已经开始得到认可。

俞芳的回忆文章提到了在其他人那里很少提及的大太太朱安,这使继续在鲁迅的家庭生活中拼贴完全的鲁迅镜像成为可能。在这之前的研究者能够看到鲁迅冲破封建婚姻的勇气,但是很难体会到同样作为封建婚姻受害者的朱安,在得到鲁迅与许广平结婚后对自己与鲁迅婚事的感受: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

“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¹⁶⁾

俞芳对朱安的这一回忆,揭开了鲁迅不幸婚姻的缺口,使我们在同情朱安不幸生活的同时,也能同样感受到鲁迅作为一位由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中的中间人的痛苦: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¹⁷⁾

鲁迅对母亲的孝顺与对封建婚姻的默认同样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位韧的生存者怎样以一己之力去“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¹⁸⁾。从这样的回忆中可知鲁迅在与许广平结合前,确是在以一位战士的立意来完成生命的耗度的,去抗衡封建时代的最后遗毒的。对于面临如此困境的鲁迅,我们可以承认鲁迅是痛

苦的,但这痛苦并不是属于他个人的痛苦,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不幸即在于此。

周海婴在世纪末写就的《鲁迅和我七十年》应该是回忆鲁迅文章中最后一批出现的文章了。在这本书中有一段描写鲁迅为年幼的海婴上药的记载,这对于习惯了关注公共话语中鲁迅镜像的读者来说,不失为是一次新的寻找温暖家庭的机会:

记得我小时候膝盖部位长过一疮,出脓穿破后,一个多月总不长新肉,露着一个大洞,经常流血不止,父亲给我用这种药粉,填入伤口,过了不久,就从里向外长出新肉,伤口逐渐得到愈合。几十年的时间,像流水一样逝去,但是父亲弯下身,细心地给我敷药的情景,至今犹在眼前。“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他的名言,也是对自己的很好写照。⁽¹⁹⁾

鲁迅在海婴的记忆中是一位慈祥的,懂得怜爱孩子的好父亲。而从全书来看,海婴终其一生都是鲁迅的孩子。他不能离开鲁迅的影子,也只能在鲁迅的影子下阐释鲁迅。在众多的回忆后,周海婴给了鲁迅回忆的最后一声震响。

返观20世纪的鲁迅回忆史,我们在这期间经历了一个从对鲁迅的渴望,到对鲁迅的神化,再回到对绚烂鲁迅重归平静的过程,每位回忆者在实现返照历史镜像的映射中,都在以自己的语言呈现了一个存在过的鲁迅。因为不可免责的原因,实现鲁迅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在公共范围与私人系统延续的意义,确实使得后人在承受鲁迅精神的过程中遇到了同样不可避免的对历史想象的任务。其实就鲁迅的意义来说,回忆本身既是一个关于历史想象的问题,又是一个关于现实的建造和其功能性强调过程的问题。当然,面对评述中的焦躁和记录中的漏洞并不能够完全的成为拼贴鲁迅的理由,一个久已远去的鲁迅早已升入不可穷尽的黑色夜空,化为闪闪的星辰。不可能再现的鲁迅与我们追逐这样一位卓越思想家心灵交汇的途径,除了紧张在鲁迅的著作外,对鲁迅的外围感悟也许同样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深入鲁迅内心的增长点。尽管我们警惕在这外围细目的模糊与内在轮廓的把握中,对鲁

迅的消化仍将成为我们在新的现实建构中体察知识分子良知的镜子。鲁迅的时代可以成为时间单维指针的印迹滑落在1936年的终点,但鲁迅作为知识者的奋进和明辨却不能不成为后来者在对我认证的理想到,作为感动我们的理由。

注释:

(1) [法]拉康《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本文选自《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1页。黑体字为原文所加。

(2) 曙天女士:《日记片断》。选自《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3) 马珏:《初次见鲁迅先生》,选自《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4)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选自《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版第46页。

(5) 许寿裳:《二四·日常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98页。

(6) 阿累:《一面》,选自《高山仰止》,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17页。

(7) 美子:《作家素描--鲁迅》。选自《高山仰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8) [日]鹿地亘:《鲁迅访问记》,自《海外回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9) 许广平:《致李铁根的信》。《许广平文集·第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10) [12] [美]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选自《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页。

(11) 陆万美:《追忆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本文选自《高山仰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15页、第212页。

(13) 许广平:《致毛居青的信》。《许广平文集·第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14) 周建人:《学习鲁迅深入批修》,《回忆鲁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页。

(15) (17) (18) 黄山定:《怀念良师鲁迅》,选自《高山仰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16) 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选自《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第253页。

(19) 周海婴:《记忆中的父亲·父亲为我治病》,《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1页。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